

“政务红包”，醉翁之意非卖萌

■ 邓海建 媒体人

在市民眼里，政务信息平台是地方政府最权威的资讯发布地，没想到今年也开始发支付宝红包了。2月1日，广州、南京、成都、武汉、西安、石家庄、无锡等七座城市，联袂在其政务微信发布平台上向市民拜年，并派发总计20万元的现金红包。(2月3日北京晨报)

这些日子，腾讯玩“雾霾脸”，阿里抛“五福谜”，你来我往，热闹喜气。不仅商家豪掷千金，不少政务平台也搭上了“红包雨”的顺风车：七城联合给市民发红包尚属首次，市民们惊呼这才是真正的“城会玩”。相较于七城数千万的人口数量来说，政务平台派发的20万红包，不过是“撒撒胡椒粉儿”，但这样的游戏，显然“功夫在红包之外”。

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往前看，2月1日小年这天，就连国资委也忍不住加入“战局”，带着中粮集团、南方电网、中国电信三家央企给粉丝派发万元新春红包，被粉丝称为最“亲民”的部委。往后可，从中央到地方，在政务平台发红包的，恐怕会“蔚然成风”，而带着核心价值观或城市



宣传语等口令抢红包，或者也会成为正能量的另一种表达范式。

中国互联网巨头BAT的“红包战”，当然是出于用户粘性、客户链条的考量，争地盘、抢市场。业界认为，2016年将是真正的“移动支付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

月，中国使用网上支付的用户规模达到4.16亿，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手机网上支付增长尤为迅速，用户规模达到3.58亿，是整体网上支付市场用户规模增长速度的1.8倍。当此背景下，以红色“吸粉”，自然不是什么亏本的买卖。

理解了以上背景，“政务红包”的醉翁之意，也许就渐次水落石出了。一则，登陆

“法不留情”才能安全出行

■ 邓力 国企职工

记者昨天从北京铁路警方获悉，一名男子因携带仿真枪进火车站，被铁路警方治安拘留。这是今年春运以来，首个因携带违禁品进站被拘留的乘客。(1月31日《京华时报》)

春运，是个老调常谈的话题。在中国，春节是最受关注的传统佳节，一个春运就可以使候车室变得人山人海，站前广场拥挤不堪，售票窗前的中国式长龙……“一句过年、一念回家”，正是有了这样的盼头，再艰难的旅程都挡不住回家的脚步。铁路是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如今，高铁大量投入运营，且具有安全、便捷、舒适、准点等优势，所以依然是广大民众出行的首选，同时也给铁路春运的安全出了一道大难题。

不管是乘坐汽车、火车、轮船、还是飞机，公共场所，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旅途匆忙，很多人却忽略了安全问题，有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四肢乱跳的、管制刀

具、仿真枪支等等，可谓花样百出，不胜枚举。而列车车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公共场合，人员多，如果放任这些违禁品上车而导致险情发生，后果必将不堪设想。

无论搭乘何种交通工具，都有规定的违禁物品不得携带，违法必究。违禁品种类虽说繁多，但除少数特殊的品种外，基本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普遍的、熟知的物品；违禁品也并非是一个新鲜话题，而是一个常识问题。在春运这样的特殊时期，还有人携带仿真枪，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铁路的法律法规，威胁到了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必须依法对其进行惩处，以还出行路上的一个“平安”。

认真执法，严格执法，这是铁路民警的职责所在，义务所驱；他们只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与义务，才能为民众的出行保驾护航。“法”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只有做到“法不留情”，这个社会才会有更多的“情”；只有做到“法不留情”，人们才能够安全出行。



● 戏画闲言

圈钱骗局：份额买卖艺术品

■ 吴之如 文/画

《北京商报》报道，继2015年6月广东岭南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在澳门制造了“4亿港元美人枕”假拍事件后，岭南文化背后的大老板万丰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又出问题，违法买卖艺术品份额，并私自冻结投资者账户资金或超过10亿元，涉及投资者数万人。至此，万丰国际利用艺术品的圈钱骗局也浮出水面。

动用各种虚假宣传手段，把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值成十倍百倍甚至更夸张地吹嘘为天价“极品”，更编出此物将凶猛“升值”的无稽神话，然后设计出“份额投资”的怪异“模式”，引诱数以万计的艺术品投资者纷纷慷慨掏兜，这一圈钱骗局被“万丰国际艺术品”老板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运用，居然圈得超过10亿元的资金，真是小骗术捞了“大金娃娃”啊。

轻视职业教育是社会的病症

■ 杜学峰 职员

“不要与社会不良青少年或职高学生混在一起，以防上当受骗或被欺负。”这句话出现在1月25日浙江省海盐县行知中学发给学生家长的一则短信通知中，与“走路时放慢速度”等温馨提醒同时出现，落款是“行知中学德育处”。(1月28日《中国青年报》)

其实，即便是对所谓的社会不良青少年，也不宜使用带歧视性的字眼，何况是对与普通中学生别无二致的职高生。当然，如果考虑到中学生属未成年人，防范意识及能力弱，容易受社会不良习气影响，因而不宜与有劣迹的社会不良青少年“混在一起”尚可理解的话，那么，职高生的“劣迹”在哪？有哪些地方“不良”？又凭啥把他们与社会不良青少年并列、作为中学生不能“混在一起”的对象呢？

尤其让人困惑的是，这则发给家长短信的通知，竟为学校德育处的“杰作”。可见，这则勿与职高生“混在一起”的提示，并不是某些老师的偶尔失言，亦非个别领导的一己偏见，而成为了学校德育处的“共识”，并以德育的名义，向学生及家长传播。由此看来，在这所学校的某些教育者眼中，职高生已经成为了打入另册的“另类”。

显然，这是在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职业教育，视之为“二流教育”，把职高生更看作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差等生”。因而，在他们看来，普通高中是“天之骄子”的摇篮，而“天之骄子”与“差等生”为伍，势必受到不良影响。这则让公众诟病的“温馨提示”，正是这类根深蒂固偏见的产物。

而偏见的背后，既是对劳动及劳动者的轻视，也是对职业教育的无知。就算职高生通过职高教育，获取了相应的专业知识及职业技能，成为技术工人，又有何不好？就能成为不能与普通中学生“混在一起”的理由？照这个说法，

推而广之，岂不是我们社会的工人、农民、售货员、服务员、快递员、清洁工等一应劳动者都要划入不能“混在一起”的范围？

何况，职高生就注定不能“鱼跃龙门”么？未必！在日益多元化的当代，职业教育因校企联合办学的特点，其教育优势及就业前景被广泛看好，因而有更多的学生选择接受职业教育。同时，现在职高生毕业后同样可以参加对口高考继续升学。可以预见，在今后的职高生中，必会走出一大批掌握专业知识及熟练技能的中高级技术工人、技术创新人才乃至行业领军人才。试问，有着如此前景的职高生，又有何理由让人看轻呢？

话又说回来，普高生考上大学，今后成为白领乃至专家学者也好，职高生步入社会，成为蓝领或者技术工人也好，从广义上说，都是同样光荣的劳动者。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时代，在越来越多的岗位上，脑力劳动及体力劳动已无法截然划分。即便在现存差别的岗位，也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具备的起码共识。

而对于时下的中学生来说，正是其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的时期，而作为以德育为己任的德育处，固然需要提醒他们注意安全、防范风险，但同时也教会他们分清善恶、明辨是非，更要懂得平等待人及尊重他人。自然，前提是自身就应有正确的是非观，若己不正，又焉能正人？

值得欣喜的是，该校在收到社会反响后，第一时间通过其官方微博致歉。自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愿这是一次发自内心的歉意，而不是应对舆论的公关行为。其实，笔者更希望通过此次争辩，让中学生们懂得思考，学会成长。学生自然要尊重师长，但并不妨碍凡事多问一个为什么。譬如，当接到德育处的短信时，不妨问一问：职高生有啥不好？请老师明示！

支付宝，在红包页面输入统一口令“我的城市我的家”就可以争抢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此一来，既宣传了城市精神与形象，又拉近了政府与市民之间的关系。政务平台偶尔“卖萌”，传递的是公共权力的人文性、亲切感。二则，这一小小创意背后，还可透视中国城市互联网化、智能化的洪流大背景。支付宝交水电煤气费，在很多城市早已成为缴费习惯。不远的将来，在公共财务生活中，网络支付与网络清算，必将成为公共生活中的效率首选，用“小红包”撬动市民的“大习惯”，这是性价比超高的一件事。

当然，如果非要就红包论红包，这也是营造年节氛围、延续年俗传统的有益尝试。2014年三亚政府派出物价补贴红包，而澳门政府更是持续多年派发返税红包，数量虽然有多有少，但都赢得了围观者的点赞声，在大小不等的红包里，窥见地方部门关切民生的务实初心。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支付宝红包成了政务平台的策略之选，这不仅仅是一场游戏，更不仅是一场博弈，而是寄寓姿态与方式的“探路”。比之于“穷得看不起朋友圈”的吐槽，政务平台爽气的“红包”，也许更多了些暖意，更多了些情意。

不可小觑去产能中“人”的问题

■ 黄枢梓 公务员

据新华社网站日前报道，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预计，钢铁行业减产可能造成40万工人失业，上游和下游行业还会有更多从业者受到影响。他还说：“钢铁行业大规模裁员可能威胁社会稳定。”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去产能并不仅仅是钢铁行业，还有庞大的煤炭行业，再加之制造业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也可能会有较大规模的裁员。由此带来的新一轮“下岗潮”，将是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然而，有些机构和舆论对此似乎过于轻描淡写，根本没有将其当回事。在此之前，新华社报道援引中金公司的报告称，推进去产能对失业率影响“很小”。据中金预计，未来2至3年，若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钢铁、煤炭开采、水泥、造船业、炼铝和平板玻璃减产30%，将造成裁员300万人。相当于城镇就业的0.3%，小幅推升失业率。即使就业的大盘相对平稳，也不可忽视大批工人失业对社会稳定产生的冲击力。

还有权威媒体发文在阐述淘汰“僵尸企业”时说：“万一下岗分流真‘摊’到僵尸企业的职工头上，也不必有过大的压力和包袱。如今的就业形势、社会保障和国家财力都有了很大进步，完全能够妥善应对经济转型中的阵痛。只要努力提升自我、有一技之长，总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这番话语看似劝慰开导下岗人员，但多少也让人觉得似乎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谁能设身处地替面临此轮下岗的产业工人着想呢？从年龄结构上看，此轮下岗的煤炭、钢铁以及制造业工人，大都是些步入中年甚至年过半百的人，他们曾经把青春的激情和汗水挥洒在岗位上，为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持续增长作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而在当前经济发展新旧动能切换的转型期，却要离开自己已经熟练、习惯的工作岗位去面对市场另谋生路，这在感情上无疑是让他们是很难接受的，也是面临很大困难和诸多实际问题的。

因此，在去产能过程中绝不可小觑“人”的问题，不能借“市场化”的名义，将下岗工人无情地完全推向市场。“人”的问题被李克强总理列为在去产能中要突出解决的三个关键性问题之一，他明确指出“要妥善安置职工，兜牢民生保障底线，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为此，国务院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按规定对地方化解过剩产能中的人员分流安置给予奖励。对于企业确需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国务院要求应依法向下岗人员支付经济补偿，偿还拖欠工资、补缴社会保险费，并做好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等工作。

笔者认为：各地在落实国务院有关政策和失业保障政策，维护下岗工人合法权益的同时，还有必要出台下岗工人再就业培训优惠政策、创业创新信贷资金支持政策，组织下岗工人参加适应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的再就业技能培训，引导他们向第三产业和一些新业态转移就业、创业，实现以“人性化”方式解决好去产能中“人”的问题，以利于社会稳定和谐。

下调 GDP 增速目标揭开经济生态发展序幕

■ 莫开伟 财经评论员

截至1月26日，全国31个省份中，已有27个省份召开了“两会”。多地省级地方两会对GDP、雾霾、户籍改革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16个省份在2015年基础上，下调了GDP增速目标(1月27日《新京报》)。

对16个省份下调GDP增速目标，社会各界大可不必感到意外和失落，而应对之抱以称赞和庆贺。因为，这些调低GDP增速目标的省份并不是对地方经济发展丧失信心，更不是对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无能为力的表现；而是在经济发展现实倒逼下理性经济发展观的回归，也是中国经济不断走向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开端。

众所周知，经过30多年中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直到今天，由于世界经济疲软大环境影响，中国经济已步入严重产能过剩时代，经济去产能、去杠杆压力较大，尤其资源消耗严重、环境破坏严重，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制造了很多障碍和阻力，这一切都需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即从过去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唯GDP经济发展方式向追求资源环境友好和质量效益型并重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种转变需各级政府拿出勇气和胆量，并抱着壮士断腕的坚定决心。今天，16个省份调低GDP增速不仅是适应经济环境发展变化的需要，更是推进经济供给侧改革的现实需要。如果地方政府仍没有认清当

前经济发展严峻形势以及对环境资源保护的危险感和紧迫感，中国几十年积累的经济问题将积重难返，经济结构优化将成奢望，民众生活幸福指数提高将成泡影。

显然，GDP增速目标高低已成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风向标，直接决定各级政府的经济治理行为；GDP增速目标调低显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经济理念的根本转变，懂得了经济发展是一部曲折波浪演进历史，现在调低GDP增速是“以退为进”，以便将来经济更好地发展。从16个省份调低GDP增速目标指标看，彰显了四大特点和优势：

一是无论经济发展地区、还是经济落后地区，除了重庆等少数省市之外，绝大部分省份GDP增速目标降为个位数，展示了各级政府从片面追求GDP总量向追求GDP质量转变，为经济摆脱粗放模式向集约化方向发展奠定了牢固思想基础。

二是不管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落后地区，GDP增速都设定了合理区间值，可更好地引导预期，使GDP更有弹性可操作性，为各级政府提供GDP发展足够的操作空间；同时，可让地方政府把更多精力转到结构调整上，实现经济结构真正优化，为推动转型发展、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是GDP更多地体现了绿色环保特色，这是经济治理方式的巨大进步。如北京设立了雾霾下降5%目标，并通过相关立法；拟完成300家制造和染污企业退出任务；河

北省通过了《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对政府及其部门责任、各类污染源防治措施、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区域协作机制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山东对大气污染物排放不达标企业要依法实施限产停产治理，抓好燃煤电厂、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减少散烧煤总量等等，都为中国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环境基础。

四是GDP更多地体现了民生情怀，让民众能充分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如河北提出到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并把户籍制度改革当成各地“去库存”重要手段；甘肃省提出了棚户区改造货币化补偿安置率提高到50%以上，制定落户城市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保障范围政策；广东提出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青海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居住证制度“双落地”，进一步放宽西宁市落户限制，建立农牧民进城购房和租房财政补贴政策；上海广西着手调整产假制度，适当延长妇女产假和陪护假等等，这一切政策措施，让GDP中民生占比更加上升，推动民众生产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可以断言，GDP增速目标调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福音，它意味着中国经济生态发展序幕已被揭开；也可期待，中国经济将步入良性运行轨道，也将开启经济发展新纪元。